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文 选修

中国文化经典研读

教师教学用书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编著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文教育研究所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文

选修

中国文化经典研读

教师教学用书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编著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文教育研究所

人民教育出版社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 语文 选修

中国文化经典研读

教师教学用书

人民教育出版社 课程教材研究所

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编著

北京大学中文系 语文教育研究所

*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90 毫米×1 240 毫米 1/16 印张: 13.25 字数: 343 000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107-20278-0 定价: 20.10 元
G·13328 (课)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100081)

前 言

这套《教师教学用书》是与《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文（选修）》相配套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教师掌握和使用教科书，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这一册是与《中国文化经典研读》配套使用的，供任课教师在教学中参考。

中华民族在东亚大陆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中，经过数千年的文明演进，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文化中的一些精华要素，如民本思想、务实精神、贵和意识、中庸之道、直觉思维等，作为中华民族健康而有活力的文化因子，不但成就了我国封建时代的繁荣，而且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现代社会的伦理生活、经济生活有着很大影响。《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作为新课标高中语文选修课之一，目的是让学生通过研读课文，对中国文化典籍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主要特点和精神实质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学习这门选修课，我们可以体会到儒家的博雅与仁爱，道家的任真与旷达，史家的凝重和严谨，禅理的机趣与幽深，政治家经世济民的策略，改革家务实求新的观念，以及学问家对理性的追求。本册《教师教学用书》以落实教科书的设计理念为原则，以研读理解课文为核心，以解答练习为辅助，并给予适当的教学设计提示，附以丰富详实的教学参考资料，希望给教师的教学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底本。

本册《教师教学用书》依照教科书的单元次序编排，每个单元的内容包括：单元说明、课文研读、教学设想、关于练习、有关资料几个部分。

“单元说明”包括教学目标和单元介绍两项。教学目标是就本单元教学预期达到的目标提出建议，有宏观的，也有具体的；有内容理解方面的，也有语文素养方面的。单元介绍则是就本单元的专题领域及思想价值作概略的说明，并适当从教学组织上提出建议。鉴于各单元内容难易深浅不同，单元介绍也有详有略。

“课文研读”是教学参考的主体，包括文化背景、内容理解、问题研讨等内容。文化背景是就本单元所选“经典原文”和“相关读物”所涉及的社会、文化、学术背景作简略介绍，使学生在宏观的文化视野中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内容理解是课文研读的核心部分，以分析讲解为主，目的是帮助学生切实把握课文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兼及篇章结构、写作方法和语言运用等，并注意从与当代文化对比沟通方面加以阐述。问题研讨（仅限于“经典原文”）是就课文的重点难点问题展开讨论，希望以探讨问题的方式深化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活跃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学术探究意识。

“教学设想”是就教学过程、教学组织方面提出建议，提示教师根据单元专题的特点，抓住课文的重点难点，以切实有效的方法组织教学。

“关于练习”是对课文的“思考·讨论·练习”所作的解答，为学生解题提供一个基本的参考答案。有的练习难度较大，或开放度较高，则提示一些解题思路或指导。

“有关资料”包括扩展阅读、参考译文、论析文章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扩展阅读是选取本单元课文（一般限于“经典原文”）未节录部分，或该书该作者的其他文章（多为节选）作扩展阅读，加以简注，并适当作内容提示，希望收到与课文学习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效果。参考译文是对课文的白话翻译，以直译为主，希望藉此贯通文意，并让学生体会文言与现代汉语在词汇、表达方面的联系与差别。论析文章是选取几篇背景介绍或解析课文（以“经典原文”为主）的文章，为教师教学提供更为丰富的材料。这些文章有总体论述的，有具体解析的，教师可根据教学需要撷取选用。

增加选修课的比例和分量，是普通高中课程标准教材改革的重要特点。《中国文化经典研读》这一课程，其所涉及的中国文化知识广博深厚，在学习过程中会有很大难度。我们在编写这本《教师教学用书》时，阅读参考了大量相关的中国文化著作以及有关研究论著，力求做到解读恰适合理，建议切实可行。恳切希望老师们多提宝贵意见，把在教学实践中遇到的困难、疑问，以及在教学中形成的不同见解观点反馈给我们，以便我们改进工作，使这本书更臻完美。

参加本册《教师教学用书》工作的有，主编：李世中；编者：李世中、贺敏、朱于国、胡兰江、刘丰、徐慧琳、易晓、张一玮；责任编辑：朱于国；审稿：李世中、熊江平。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
2007年1月

目 录

第一单元	入门四问	(1)
第二单元	儒道互补	(11)
第三单元	春秋笔法	(46)
第四单元	修齐治平	(65)
第五单元	佛理禅趣	(86)
第六单元	家国天下	(103)
第七单元	天理人欲	(127)
第八单元	科学之光	(149)
第九单元	经世致用	(171)
第十单元	人文心声	(187)

第一单元

Di Yi Dan Yuan

入门四问

教学目标

1. 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概况，掌握四部分类法，回顾并梳理自己了解的中国古代文化著作。
2.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现代意义，学会以现代眼光观照古代文化经典。
3. 了解本书的结构、编排思路与学习方法。

单元介绍

本单元是全书的绪论部分。设计了四个问题：一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概况，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产生与传播状况，三是中国文化典籍的现代意义，四是本书的结构与编排思路以及学习本书的方法。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汗牛充栋，内容丰富，要在限定篇幅之内系统展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全貌，必须借助目录学的成果。所以教材在处理第一个问题时，运用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对中国古代的文化经典做了宏观的梳理。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古人治学一个很重要的入门途径：从目录入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十七史商榷》）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垣也说：“目录学就好像一个账本，打开账本，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可以了然。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要先摸摸底，到深入钻研时才能有门径，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也就可以较容易地找到了。”（《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

第二个问题讲的是“中国文化经典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产生与传播有什么特点”。如果说第一部分是横向分类，那么这一部分则是纵向展开，按历史发展的顺序所做的梳理。实际上这也体现了古人“治学要先治史”的观点。

对这一部分的内容及其与教材的对应情况，我们可以用图表的形式作一总结。

时期	文化背景	文化经典代表作品	对应单元	专题
春秋 战国	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变革时代。西周以来建立的礼乐制度开始瓦解，群雄争霸，征战频繁。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各种主张和学说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形成了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	《老子》《论语》 《孟子》《庄子》 《墨子》《韩非子》 《荀子》等	第二单元 儒道互补	哲学一
春秋战国 至两汉	在先秦大变动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历史著作，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基本精神。在两汉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下，出现了具有宏大规模和皇朝史格局的纪传体通史。	《尚书》《春秋》 《左传》《史记》 《汉书》等	第三单元 春秋笔法	史学

续表

时期	文化背景	文化经典代表作品	对应单元	专题
西汉	中国古代重视礼法，礼书在历史典籍中具有重要地位。	《礼记》	第四单元 修齐治平	哲学二
两汉至隋唐	佛教传入中国，并且开始了它的中国化进程。	《百喻经》《坛经》	第五单元 佛理禅趣	哲学与宗教
唐代至清代	与历史著作的发达相关，史学的研究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著作，它们不仅总结了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对研究其他相关学术，也有启发意义。	《史通》《文史通义》	第三单元 春秋笔法	史学
唐代	唐代社会空前繁荣，而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贞观时期又是历史上著名的“盛世”，号称“贞观之治”。	《贞观政要》	第六单元 家国天下	政治学
宋代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转型期，从文化上看，中唐以后禅宗的盛行、古文运动的开展和理学的兴起，形成了文化的新动向。	《朱子语类》	第七单元 天理人欲	哲学三
明代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出中国的早期启蒙思潮。	《焚书》		
先秦至明代	中国的科学技术自成体系，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也产生了一些伟大的科技类著作。明代科学家总结了前人的成果，写出了一批集大成的科技著作。	《水经注》《齐民要术》《九章算术》《伤寒论》《营造法式》《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	第八单元 科技之光	科技
明清之际	明清易代，社会剧变，促使了早期启蒙思潮向纵深发展，一是出现对封建专制体制的批判和反思，一是提倡“经世致用”成为学界思潮。	《明夷待访录》	第六单元 家国天下	政治学
		《日知录》《文史通义》	第九单元 经世致用	学术思想
近代	近代是中国社会的又一个转型期。在文化领域，比较突出的现象是西方理论的引进，如何将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结合起来，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	《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摩罗诗力说》《人境庐诗草》	第十单元 人文心声	文学思想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本册教材是根据历史发展的顺序按照专题进行编排的，教学时要把握这个特点。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文化经典在现代文化建设中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我们也用表格的形式进行总结。教师也可以在讲授完本书之后，引导学生针对本书所选著作的思想精华，思考其现代意义，并用此表格的形式进行填空。

要点	相关论述	现代意义
现实性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积极入世，求真务实，是中国文化经典的底蕴，也是中国文化经典至今仍具有启发性的的重要原因。
民本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下为主，君为客。”	可给我们今天的国家治理提供借鉴，有助于我们理解“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治国思想。
包容性	“礼之用，和为贵。”“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而不同。”“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这个“和”包括和谐、和善、合作等多方面的意义。古人认为，只有和衷共济、同心同德，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样的思想与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开放趋势也是一致的。中国文化经典中对“和”的提倡，可以成为促进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和谐共存局面形成的思想资源。
对自然的亲和态度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中国古代一向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人是大自然和谐整体的一部分。所以，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主张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这可以为解决世界性的环境问题提供理论源泉。
其他	……	对道德的倡导；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艺术审美的探究等。

第四个问题是“怎样学习本书”。在这一部分中，介绍了教材的编辑思路、结构框架，以及学习本书的一些方法。建议由学生自行阅读、体会。

总之，本单元是一个中国文化经典的绪论课，建议以学生自读为主，教师根据学生的情况随机组织讨论，以深化认识。

关于练习

一、请把以前学习过的中国文化经典作品做一个梳理，并参照“经”“史”“子”“集”的分类法，列出一份书目。

设计这道题一方面是为了引导学生对以前学习过的文化经典著作做一个回顾，以便于在学习本书时能联系起来，达到融会贯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通过实践了解古代的四部分类法。

参考答案略。

二、在遇到中国古代文史方面的问题时，你经常使用的工具书有哪些？请与同学们交流使用的方法与体会。

熟练使用工具书，解决阅读古代文化典籍过程中的难题，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此题的设计在于引导学生了解一些常用的文史工具书，养成查阅工具书、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常用的文史工具书在“知识链接”中列了一些，可以参考。

参考答案略。

三、请结合以前所学过的中国文化经典，谈谈你对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认识。比如，儒家强调“孝”，有人说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当继承发扬；也有人说，“孝”要求的是无条件、无

原则的顺从，不值得提倡。你是如何看的呢？

这个单元从总体上对中国文化典籍的概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作了说明，学生在此之前也有了一些初步的认知。应该引导学生通过讨论，畅谈对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认识，为本书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在学习传统文化的同时，能够时刻思考它的现代意义，为我所用，这是学生学习这门课的一个重要方法。讨论的话题可以是关于“孝道”的，也可以自行选择。建议在本书学习完成时再进行一次讨论，并比较前后两次讨论学生的观点有无不同，有什么新的收获。

参考答案略。

有关资料

一、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

中国文化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中华民族是由许多的民族（或称为种族）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各族的文化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丰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

从历史来看，不能不承认，汉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汉族文化曾经对各兄弟民族的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但也吸取过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成就。汉族和各兄弟民族，彼此之间有一个长期的文化融合的过程。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这发展过程中，虽经常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因而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影响及于国外，对于世界文化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中国文化在几千年中，巍然独立，存在于世界东方，除了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物质生产的原因）之外，还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受帝国主义的欺凌，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无能，由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人们特别注意考察中国旧有的思想意识中的消极衰朽的方面，注意考察旧有思想意识中的陈腐萎靡的病态。这当然是必要的。对于这些缺点、病态，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坚决地加以改革。但是，如果中国文化仅仅是一些缺点、病态的堆积，那么，中华民族就只有衰亡之一途了。过去，一些帝国主义正是以此对中国进行恶毒的攻击。我们在严正地予以反驳的同时，应当注意考察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积极的健康的要素，深切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指导作用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力量。

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又获得了新生，进入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新阶段。中国文化能够历久不衰，虽衰而复盛的情况，证明了中国文化中一定有不少积极的具有生命力的精彩内容。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指导中国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这里试举出四点：

(1) 刚健有为；(2) 和与中；(3) 崇德利用；(4) 天人协调。我认为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略说如下。

(一) 刚健有为

《周易大传》提出“刚健”的学说，《彖传》说：“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又云：“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又云：“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这

些都是赞扬“刚健”的品德。《说卦》云：“乾，健也；坤，顺也。”健是阳气的本性，顺是阴气的本性。在二者之中，阳健居于主导地位。《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周易大传》强调“刚健”，主张“自强不息”，这是有深刻意义的精粹思想。

从汉代到清代，两千年之中，《周易大传》被认为是孔子的著作，它是以孔子手著的名义产生影响的。所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在历史上曾对很多知识分子起过激励的作用。事实上，《周易大传》并非孔子所著，“刚健”之说应是战国时代儒家中讲《易》的学者提出来的。“刚健”虽不是孔子提出的，但孔子确实比较重视“刚”。《论语》记载：“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枋。’子曰：‘枋也欲，焉得刚？’”（《公冶长》）郑玄注云：“刚谓强志不屈挠。”《论语》又载孔子云：“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可见孔子肯定“刚”是有价值的品德。《周易大传》的刚健之说实渊源于孔子。

孟子鄙视“以顺为正”，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生活准则。《孟子》记载：“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大丈夫应有独立的人格，遵守一定的准则，不屈服于外在的压力。孟子这种见解与《周易大传》的刚健思想有一致之处。孔子重“刚”，老子则贵“柔”，两说相反，都有深远的影响。老子提出“无为”说，孔子也尝赞美无为的政治，但孔子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有为，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己。”（《阳货》）孔子自称“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同上）他坚决主张有所作为，表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

宋代周敦颐受道家影响，提出“主静”之说，在宋、明时代，影响很大。到明、清之际，王夫之重新肯定了《周易大传》的刚健学说。王夫之说：“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周易外传·无妄》）又说：“惟君子积刚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动。”（《周易内传·大壮》）王夫之有力地宣扬了“健”与“动”的学说。

《周易大传》关于“刚健”和“自强不息”的思想，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动中国文化向前发展的积极作用。而道家和部分宋儒的“柔静”学说，则是“刚健”思想的一种补充，两者相互对峙，相互引发，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面貌。

（二）和与中

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有所谓“和同”之辨。“同”是简单的同一，“和”是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谐和。《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的言论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史伯区别“和”与“同”，“以他平他谓之和”，意谓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做和，这样就能产生新事物，所以说“和实生物”；“以同裨同”，即把相同的事物加起来，那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论和同的区别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这所谓和，也是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君、臣之间，臣能提出不同的意见，君能容纳不同的意见，然后可称为和。史伯、晏子关于和同

的思想，一是要求多样，二是要求平衡。这是一种促进文化发展的思想。

孔子也区别了和与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看来孔子是同意晏子关于和同区别的言论的。孔子对于和、同之辨未多讲，而提出了“中庸”的观念。后来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篇》，对中庸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于是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后来的思想家对中庸有不同的理解，因而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也不是单纯的。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论语·雍也》）对于中庸的含义未加说明。《中庸篇》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又云：“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里以“时中”“用中”来解说中庸，时中即随时处中，依条件的不同随时选取适当的标准，用中即不陷于某一极端，随情况的不同而采取确当的方法。

从汉至宋，经学家对于中庸有不同解释。郑玄诠释《中庸篇》的题义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礼记正义》引《郑目录》）这是认为中庸指中的运用。程颐诠释中庸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中庸章句》引）这是把中庸看成固定的原则。郑玄的解释是比较符合原意的。

中庸思想的主要含义是：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实现一定的目的来说，有一个一定的标准，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否则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叫做不及，超过了这个标准叫做过。如果超过了这个标准，就不可能实现原来的目的，而会转变到原来目的的反面。所谓“中庸之为德”就是经常遵守一定的标准，既不过，亦不是不及，这是中庸的品德。有些事情，确有一个适当的标准，例如饮食卫生一类的事情，确有一个适度的问题，这个度在过与不及之间。但是社会的变革，在一定条件下，需要打破原来的标准，这样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如果固守原来的标准，就会陷于停滞不前了。中庸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保证了民族文化发展的稳定性，反对过度的破坏活动，使文化发展不致中断；第二，对于根本性的变革又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三）崇德利用

春秋时代有“三事”之说。《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晋国贵族郤缺的言论说：“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正德，端正品德；利用，便利器用（用指工具器物之类）；厚生，丰富生活。正德是提高精神生活，利用、厚生是提高物质生活。《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楚国申叔时之言云：“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又襄公二十八年记齐国晏婴之言云：“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生活丰厚，器用便利，然后端正德行加以节制。幅是节制之义。晋、楚、齐三国的贵族都谈到正德、利用、厚生，可见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思想。“三事”之说兼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比较全面的观点。

《周易大传》中讲到“崇德”与“利用”的关系问题，《系辞下传》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朱熹《本义》解释说：“精研其义，至于入神，……然乃所以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适不安，……然乃所以为人而崇德之资。……至于穷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义指事物的规律，神指微妙的变化。精研事物的规律，以至于理解深微的变化，是为了实用；便利实际运用，是为了提高道德；而道德提高了，就更能对微妙的变化有更深入的理解了。《周易大传》既重“崇德”，又重“利用”，也是比较全面的观点。

春秋时代的“三事”之说，兼重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是比较全面的正确观点。儒家特重“正德”“崇德”，而对“利用”“厚生”的问题则研究得不多。道家反对“利用”，也不赞成“厚生”，这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但历代都有一些自然科学家，对“利用厚生”的实际问题进行过切实的

研究，从而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正德、利用、厚生”，“崇德、利用”的思想，虽然秦、汉以后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但确实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四) 天人协调

天、人关系问题，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文化方向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三种学说。庄子主张因任自然，“不以人助天”（《庄子·大宗师》），“无以人灭天”（同上书《秋水》）。荀子主张改造自然，“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而最重要的是《周易大传》的“辅相天地”的学说。《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所谓裁成、辅相，亦即加以调整辅助。《系辞上传》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范围亦即裁成之义，曲成亦即辅相之义。《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此所谓先天，即引导自然；此所谓后天，即随顺自然。在自然变化未萌之先加以引导，在自然变化既成之后注意适应，做到天不违人，人亦不违天，即天、人相互协调。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理想，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道路。《周易大传》在历史上是以孔子手著的名义产生影响的，所以这种天人协调的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居于主导地位。

王夫之提出“相天”之说，他说：“语相天之大业，则必举而归之于圣人。……人弗敢以圣自尸，抑岂同禽、鱼之化哉？……故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传统的观点以为“相天”是圣人的大业，普通人虽非圣人，但也与禽、鱼等动物有所不同。增加自然所没有的，改变自然所已有的，这是人的作用。王夫之的“相天”之说，是对古代“裁成、辅相”天地的思想的发挥。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近代西方强调克服自己，战胜自然，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如果不注意生态平衡，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改造自然是必要的，而破坏自然则必自食苦果。中国传统的天人协调的观点，确实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还有一个维护民族独立，为“报国”而献身的优良传统。孔子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从此以后，维护民族的尊严，保卫民族文化，便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在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有一个相互竞争、相互融合的过程，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在各族中，都有许多为国家为本族而献身的志士仁人，表现了复杂的情况。例如宋、元之际，文天祥宁死不屈，发扬了民族的正气，起了激励人心的巨大作用。许衡把南宋的学术传播到北方，也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这都是不能用简单化的办法随意抹煞的。

中华民族还有一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成就藉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的优良传统。佛教的输入和流传，表明了中国人民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佛教在中国流传之后，一部分中国佛教徒把佛教教义中国化了，做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而儒家学者在批判佛教的过程中，充实了传统儒学的思想，提高了理论思维的水平，使中国的固有学术放出新的光彩。中华民族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又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的独立性，从而对世界文化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五四运动展开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这对于除旧布新，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不但要批判封建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对过去各时代的文化，批判地加

以总结，这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一定要有中国的特点。清理传统文化的复杂内容，区别其中的精华和糟粕，肃清一切陈腐、庸俗思想的流毒，充分认识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文化遗产，并加以改造提高，这是我们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

(选自《张岱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二、我的读书经验（冯友兰）

我今年87岁了，从7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80年，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1) 精其选，(2) 解其言，(3) 知其意，(4) 明其理。

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仅供翻阅的。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地读，只要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也不要一页一页地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听说在中国初有报纸的时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五经四书一样，一字一字地高声朗诵。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念一天也念不完。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能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所以，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下面所说的就指值得精读的书而言。

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的。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心里觉得奇怪，怎么古人写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所作的东西，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为历代群众所推荐，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被刷下去了。现在我们所称为“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书之中还要有些被刷下去。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它们都是榜上有名的，我们只能看现在的榜。

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需要精读的书。这就是要一本一本地读，所以在一个时间内只能读一本书，一本书读完了才能读第二本。在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就汉语笼统地说，有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古代汉语又称为古文。详细地说，古文之中又有时代的不同，有先秦的古文，有两汉的古文，有魏晋的古文，有唐宋的古文。中国汉族的古书，都是用这些不同的古文写的。这些古文，都是用一般汉字写的，但是仅只认识汉字还不行。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古人也不会看懂我们现在的《人民日报》。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要先做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的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罗嗦。这个

缺点倒有办法可以克服。只要他不怕罗嗦就可以了。好在笔墨纸张都很便宜，文章写得罗嗦一点，无非是多费一点笔墨纸张，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就没有法子克服了。因为语言总离不开概念，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总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比如一个人说，他牙痛。牙是一个概念，痛是一个概念，牙痛又是一个概念。其实他不仅止于牙痛而已。那个痛，有一种特别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范围，有一定的程度。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无论怎样罗嗦他也说不出的，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也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可再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映。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的。他的主观上的反应、体会和判断，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从前有人说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

（选自肖东发、杨承运编《北大学者谈读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

三、初进学问界（顾颉刚）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初进学问界的人。初进学问界的人固然免不了浅陋，但也自有他的骄傲。第一，他能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别人不审量的地方审量。好像一个旅行的人，刚到一处地方，满目是新境界，就容易随处激起兴味，生出问题来。至于那地方的土著，他们对于一切的东西都接触惯了，仿佛见闻所及尽是天造地设的一般，什么也引不起他的思索力了。第二，他敢于用直觉作判断而不受传统学说的命令。他因为对于所见的东西感到兴味，所以要随处讨一个了断；不像学术湛深的人，他知道了种种难处，不敢为了立一异议，害得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初生之犊为什么不畏虎？正因它初生，还没有养成畏虎的观念之故。这固然是不量力，但这一点童稚的勇气终究是可爱的。我真快乐，我成了一个旅行的人，一头初生之犊，有我的新鲜的见解和天真的胆量。我希望自己时时磨炼，使得这一点锐猛的精神可以永久保留下去。如果将来我有了丰富的学问之后，还有许多新问题在我的胸中鼓荡，还有独立的勇气做我的判断力的后盾，那么我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了！

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使我极高兴的。我固然有许

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对今人如此，对古人亦然。唯其没有偶像，所以也不会用了势利的眼光去看不占势力的人物。我在学问上不肯加入任何一家派，不肯用了习惯上的毁誉去压抑许多说良心话的分子，就是为此。固然有人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偏的，不偏于甲派便偏于乙派，但我觉得要保持客观的态度，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种种不同的派别，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即使不能完全不偏，总可以勉力使它少偏一点。也有人说，为学不能不投入家派，正如不能不施用假设，有了假设才有入手的路，所以家派是终该选定的，尽不妨俟将来深入之后而弃去。这种话在以前是可以说的，因为那时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学问的基础既不建筑于事实上，研究学问又苦于没有好方法，除了投人家派之外得不到一点引路的微光，为寻求一个下手处计，也有选择家派的需要。例如你要菲薄《诗》毛氏学，便当从齐、鲁、韩三家或其中的一家研钻下去；等到自己的学问足以自树了，再脱离家派而独立。但到了现在，学问潮流已经很明白地昭示我们，应该跳出这个圈子了。我们自有古文字学、古文学、古器物学、古历史学等等直接去整理《诗经》，《毛传》固要不得，就是《三家诗》也是《毛传》的“一丘之貉”，又何尝要得？至于我们为要了解各家派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免要对于家派有所寻绎，但这是研究，不是服从。我很怕别人看了我表彰郑樵、崔述诸人的文字，就说我做了他们的信徒而来反对毛公、郑玄，所以现在在此附带声明一句：我对于郑樵、崔述诸人决无私爱；倘若他们的荒谬有类于毛公、郑玄，我的攻击他们也要和对于毛公、郑玄一样。希望读者诸君看了我的文字也作这等的批判，千万不要说“承你考辨得很精细，我有所遵循了”这一类话！

《老子》说“自知者明”，希腊的哲学家多劝人知道自己。在这一方面，我“当仁不让”，自认为无愧的。我既不把别人看得神秘，也同样的不把自己看得神秘。我知道我是一个有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世务上，只显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张、优柔寡断，可以说是完全无用的；但到了研究学问的时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强固，有兴趣，有宗旨，有鉴别力，有自信力，有镇定力，有虚心和忍耐。所以我为发展我的特长计，愿意把我的全部生命倾注于学问生活之内，不再旁及他种事务。我知道固有的是非之心的可贵，所以不受习惯的束缚，不怕社会的威吓，只凭了搜集到的证据而说话。我知道自己的凭借，故不愿没却他人的功绩；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故不愿循着一时的意气。我知道学问是一点一滴积起来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决没有顿悟的奇迹，所以肯用我的全力在细磨的工夫上，毫不存侥幸取巧之心。我知道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东西和坏东西。我知道我所发表的主张大部分是没有证实的臆测，所以只要以后发现的证据足以变更我的臆测时，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张加以修改或推翻，决不勉强回护。因为有了以上种种的自觉，所以我以为我现在固然学力浅薄，不足以解决多少问题，但我的研究的方法和态度是不错的，我的假设虽大胆而绝不是轻举妄动，只要能从此深入，自可驯致于解决之途。

（出处同上）

第二单元

Di Er Dan Yuan

儒道互补

单元说明

教学目标

1. 了解儒道两家学说的基本思想，理解一些比较重要的概念，如“仁”“礼”“义”“无为”等，并能有自己的体会。
2. 对儒道两家学说的影响及其互补性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3. 理解课文的主要思想，熟读、背诵一些片段。

单元介绍

本单元的“经典原文”和“相关读物”所选的文章出自先秦时期儒、道两家的经典论著，即《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其中《论语》《孟子》《老子》兼具政治哲学和人生（伦理）哲学的性质，实用理性色彩较重，《庄子》（指内篇）则基本属于人生哲学，着重探讨的是如何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达到一定人生境界的问题，浪漫色彩浓厚。它们都是在先秦这块丰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距离现实有远有近，但不可否认它们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

春秋时期，西周那种邦国分封制度（周天子分封诸侯，各诸侯国朝奉周天子，为王室效力）已被打破，周王室地位衰微，无力掌控、约束各诸侯国。各诸侯国致力于武力征伐，争强图霸。最初的霸主国尚有意于维护周天子的地位，抵御外族入侵，和诸侯国订立盟约，使天下较长时间保持和平。后起的霸主国已失去这种精神，完全以争夺土地、扩张势力为目的，天下争战不断，动荡不安。春秋后期，诸侯国的数量已大大减少，只剩下十几个。而诸侯国内部的矛盾又凸显出来，不少诸侯国的国政被国内公族、卿大夫掌握，公族、卿大夫和国君之间矛盾尖锐，甚至出现了国君被逼出逃、臣子弑君篡国的事情。到了战国时期，周天子更是名存实亡。几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都想通过战争吞并其他国家，统一天下，它们之间爆发的战争规模更大，杀人更多。此外，各国还纷纷通过“变法”来富国强兵，而推行变法的领导人物大多是法家（有政治家、军事家等）。

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老子和他基本同时而略早。关于为政，孔子最看重的是“礼”。所谓“礼”，不仅指日常生活中、宗庙祭祀活动中的礼仪、礼节，还包括个人行为规范以及人与人之间、各个阶层之间所应遵循的规范。在孔子心目中，西周的“礼”已经很完备了，因此他主张取法周礼。从这种思想出发，孔子认为为政应以“正名”为先，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各守其“礼”，社会则能重新